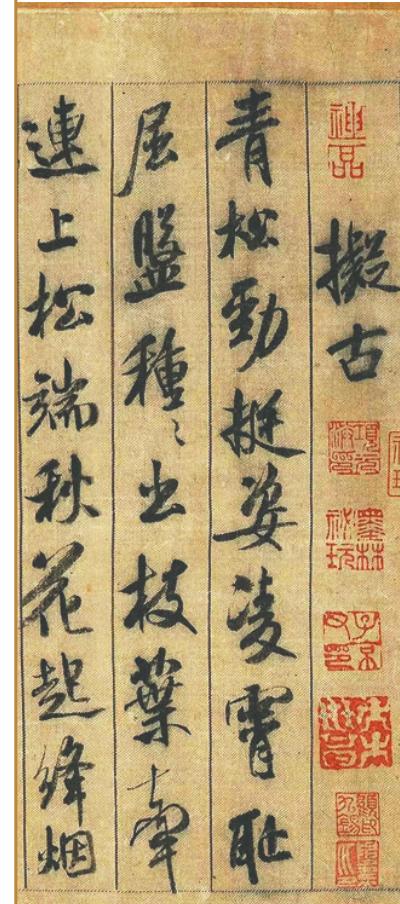




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王羲之故居的鹅池。 新华社发



王羲之像。 资料图



米芾《蜀素帖》(局部)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千年兰亭 风韵“二王”

一纸《兰亭序》，墨香千年，不仅定格了“书圣”王羲之的绝代风华，更如一幅流动的画卷，为我们展开了东晋文人士大夫的“魏晋风度”。而这份流淌于《兰亭序》血脉中的风流气韵，并未止步于王羲之一人。它更以一种深沉的方式，在王羲之父子之间悄然传承。

王羲之七岁习书，师从卫夫人，却不止步于师承。书法的精进之路，常伴枯燥与汗水。王羲之见到前人碑刻精妙，便会日夜临摹，勤学不辍。据《晋书》载，其“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”。这份对书法近乎痴狂的执着，也深深烙印在他对儿子王献之的教育之中。

王羲之对王献之有著名的“点如石”的故事相传。少年王献之一度自觉书艺有成，写就一幅自觉满意的好字请父亲品评，希望得到肯定。王羲之观后不语，只在其所书“大”字下轻轻添加了一点。王献之不解其意，复呈母亲郗璿，郗夫人细览良久，叹道：“吾儿磨尽三缸水，唯有一点似父工。”这含蓄而精准的点评，如一盆冷水，浇醒了王献之，也让他真切领悟到父亲笔下千钧之力与精微之妙。

而在教导王献之上更为人熟知的，是王羲之那“写完十八缸水”的惊人训示。相传，为了让儿子潜心苦练书法，王羲之说过：要窥得书法之堂奥，先写完庭院中十八口大缸的清水所研之墨。

王羲之以非凡的远见与近乎无情的标准，为儿子打开通往卓越的大门。因此，王献之不仅承袭了父亲的书法技法精髓，更内化了那份对书艺的执着与敬畏，最终得以在书法史上子与父并肩，成为彪炳千秋的“二王”。

书香之家 薪火相传

东汉熹平年间，大儒蔡邕矗立于学术之巅，其学贯古今，主持校订的

《六经》被镌刻为“熹平石经”，曾立于洛阳太学门外。此举震动朝野，“其观视及摹写者，车乘日千余辆，填塞街陌”。

满腹经纶的蔡邕也是书法家。“熹平石经”前后刻制时间长达九年，在日复一日、倾注心血于石碑的镌刻工作中，蔡邕对笔法、结构与力量的探索达到了新的境界，独创了名垂千古的“飞白体”，这种书体笔画中夹杂丝丝白痕，仿佛枯笔疾行所就，既有篆籀的古朴厚重，又具行草的飞动之势。梁武帝萧衍盛赞其“骨气洞达，爽爽如有神力”。

蔡邕还精研音律，将音乐文化融入生活，并常陪伴女儿习琴。他避难江南时，携年幼的女儿蔡文姬结庐而居。某日邻家灶火中传来桐木爆裂的清音，他惊呼：“此良材也！”父女二人急忙从火中抢出焦木，斫成古琴。因琴尾残存焦痕，故取名“焦尾琴”。

蔡文姬幼秉天赋，六岁辨弦的故事，在民间传为佳话。某日，蔡邕夜抚七弦琴，一弦骤断。蔡文姬正嬉戏于侧，脱口道：“第二弦断也。”蔡邕疑为女儿偶然猜中，复断一弦试之。蔡文姬头也未抬：“此次断的是第四弦。”这般天籁之耳，令蔡邕惊叹，也更坚定了对女儿悉心栽培之心。他亲授女儿典籍，督其习字作文并指点音律，使其深谙琴道。

蔡邕对蔡文姬的教育，为女儿铺设了一条通往精神高地的阶梯，使其才华得以淬炼升华。蔡文姬的才情，也在父亲的书香琴韵的长期熏陶和严苛的教导下破茧成蝶，终成博学能文、妙解音律的旷世才女。

蔡文姬在乱世中延续并升华了父亲的文化遗产。归汉后，她凭惊人记忆力默写出蔡邕散佚的四千卷藏书中的四百余篇，几乎无遗漏，成为续写汉史的基石，更让建安文学的“彬彬之盛”得以薪传后世，其结合匈奴胡笳音律与汉古琴音调创作的《胡笳十八拍》，以“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”的泣血之叹，融合胡汉艺术精髓，成为自屈原《离骚》后最悲怆的抒情音乐长诗。蔡文姬的

《悲愤诗》则开创文人自传体叙事诗先河，诗中“儿前抱我颈，问母欲何之”的母子诀别场景，以个人苦难折射时代之殇，深刻影响了曹植、杜甫等后世大家。

笔墨烟雨 父子长歌

元祐二年(1087年)，37岁的米芾携家定居润州(今镇江)。他在此亲授儿子米友仁书画技法，更以独特方式训练其观察力：命儿子以清水在石板上练字，强调“笔势需如云气流动，不拘形迹”。

米芾后于城东高筑“海岳庵”，自号“海岳外史”。少年米友仁跟随在父亲身边，共同漫游于江南烟雨中。镇江海岳庵，是他们父子俩的“墨戏”课堂。米芾常携子临江远眺，看金焦二山在晨雾暮霭中隐现，观长江浩渺、云气蒸腾。他教导儿子时，非以僵硬之法授之，而是启迪其感悟自然造化之生机与自然山水的朦胧意境：“山水心匠，自得而高也。”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，将“师法自然”“写胸中丘壑”的文人画精髓，如春雨般无声浸润米友仁的心田。米友仁在《潇湘奇观图》自题中追忆：“此卷乃庵上所见……多在晨晴晦雨间。”印证父子以自然为课堂的日常。

元祐六年(1091年)，米芾携17岁的米友仁入汴京。他带儿子拜谒翰林学士苏轼与黄庭坚，期间展示米友仁的习作，黄庭坚见其笔力浑厚，惊呼：“虎儿笔力能扛鼎！”(虎儿为米友仁小名)，当场赠一方镌“元晖”篆字的战国古印与之。

米芾首倡“信笔作之”“意似便已”的“墨戏”理论与“落茄点”(米点皴)技法，然其山水真迹惜无可靠传世之作。米友仁以《潇湘奇观图》《云山墨戏图》等杰作，将父亲的理论化为震撼人心的视觉图景。他以“米点皴”为标志，展现了江南烟雨朦胧意境为特色的“云山”画风。这一范式，成为后世无数画家取法与再创造的源泉，也使“米家山水”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清晰而璀璨的流派标识。

米芾首倡在画上题诗，而真正将此理念成熟实践并推向高峰的是米友仁。他的《潇湘奇观图》卷后洋洋洒洒的长篇题跋，诗文与画面意境水乳交融，书法本身也成为画面构图与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将诗、书、画紧密结合以表达完整意境的形式，直接启迪了元代文人画“诗书画印”合一的成熟，影响深远。

在书法上，米友仁不仅深得米芾“八面出锋”“风樯阵马”之笔法，更有突破之举：他是书法史上成功驾驭羊毫软笔并形成独特风貌的先驱大家。羊毫蓄墨丰沛，提按间产生的弹性与墨色层次变化，远较硬毫丰富。

米友仁巧妙运用此特性，于《远山晴云图》题跋《动止持福帖》等作品中，线条在纤劲与浑厚间流转自如，墨韵温润含蓄，形成了一种清雅内敛、从容蕴藉的书风。明代董其昌誉之为“如王谢子弟”，道出其书风中流露的贵族雍容气度，相较于父亲米芾的“刷字”豪纵与“颠逸”，米友仁更多了几分文人的含蓄与平和，在继承中开辟了新境。

米芾与米友仁父子，以其独特的艺术实践与理论，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铸就了不可撼动的“大小米”地位，其光芒穿越时空。

古人字与名同为哪般？

■ 马斗全

古人名之外，又有字，即现今所谓表字。字往往与名关联。如苏东坡名轼字子瞻，应取《左传》“登轼而望之”之意。“轼”为车前横木。瞻，扶轼以前瞻。又如海瑞，字汝贤，当因姓“海”且生于海边，所以取前人“不以龟龙为瑞，以贤俊为瑞”语意。而鲜为人知的是，古人竟有字与名相同者，也可以说是以名为字，这种情况还不少。

读《晋书》可知，晋安帝名德宗，字德宗；恭帝名德文，字德文；会稽王司马道子，字道子。《南史》所记南朝人中，曾两任宋之吏部尚书的蔡兴宗，字兴宗；幼有神童之誉，后为诗学者颇受梁昭明太子礼遇的刘孝绰，字孝绰；酷爱读书且著述颇丰、官至尚书左丞的诗人王僧孺，字僧孺；还有江德藻等，也都以名为字，字与名同。《北史》亦载，北朝名将鲜卑族的慕容绍宗，也字绍宗。

晋以前，以名为字者，汉代有孔安国、字安国。更早者，公元前的秦末著名义士田横，字横，只是不知田横是否最早以名为字者。

字与名同者，唐代似乎更多。魏少游、张孝忠、戴休颜、高崇文、杨燕奇、李嗣业、尚可孤、张嘉贞等人，还有名将郭子仪、张巡，著名诗人孟浩然，皆以名为字。更有田承嗣，字承嗣，其子田绪，字绪。明代杨慎的《词品》也记录了一些以名为字的词人。及至清代，曾撰著《徐都讲诗》的女诗人徐昭华，也以名为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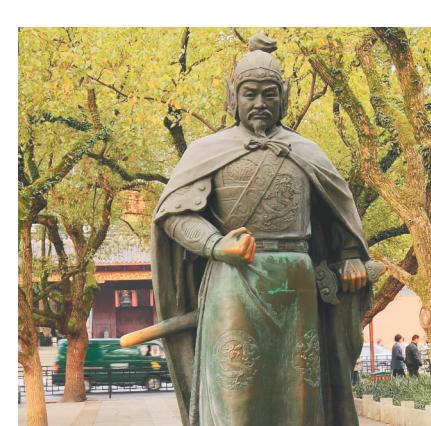
对于这种以名为字或曰字与名同的情形，难免有人会问：那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其实不然，因为古人这样做，自有其道理。

《南史》蔡兴宗本传载：“幼为父廓所重，谓有己风。与亲故书曰：‘小儿四岁，神气似可，不入非类室，不与小人游。’故以兴宗为之名，以兴宗为之字。”是其父寄厚望于其子，指望儿子兴宗业、光门庭，所以名“兴宗”外，又字“兴宗”，重复而再者，以见期望之殷切。

宋代有位教育家戚同文，字同文。《宋史》本传载，戚氏是“思见混一，遂以同文为名、字”，可知是渴望国家统一，得以“车同轨，书同文”，而名同文，又字同文。古时以名为字者，大体如此，系着重表明、反复强调之意。这样，既表明所重或所望，又不失表字的本来用处，而给人以方便。因为古之习俗，对人称其字，而讳称其名，以表礼貌与尊重，还兼有亲近之意。若因字与名相同而省去字，则会使别人不便直呼其名而又无字可称。由此可见，与名相同之字的有与无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

还有一种以字为名，却不是字与名同，而只是用其名所用之字。如宋代诗人吴大有，字有大；明代廉官冒起宗，字宗起。还是重复其名之含义。

此外，还有一种情形，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说：“唐太宗时如封伦、房乔、高俭、尉迟恭、颜籀，并以字为名。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。”因皇上称其字，于是就以字为名。与此相类似的是，因人们多称其字而少称其名，或多知其字反倒少知其名，于是便以字行了。如《全唐文》载，姚思廉，本名简，以字行。又如《唐才子传》载，朱庆余，字可久，以字行。这种情形较多，以至当代，仍不乏其例。如著名教育家叶圣陶，名绍钧，以字行。与叶圣陶交谊甚深的语言学家孙玄常，名功炎，也以字行。有意思的是，被誉为“山水诗派”鼻祖的谢灵运，即以字行，至于其名，今已没多少人知道了。而对于孟浩然，后世还真有些茫然了，已弄不清究竟是在称其名还是在称其字，只知道是指那位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。



唐代名将郭子仪雕像，“子仪”是他的名，也是他的字。 资料图

将目光投向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，会发现不少杰出的父子、父女身影。他们或以学问德行垂范后世，或凭卓越的才能与深厚的家庭渊源被后世传颂，或在特定的时代际遇中，留下了令人感佩的印迹与故事。

史上最强家学



李玉萍

明代这四人同科中进士

石波林

在海南省博物馆“世变风移”展厅《海南进士一览表》上，唐舟、陆普任、石祐和洪溥四人于明代永乐二年(1404年)考中甲申科曾棨榜的进士，此处格外引人注目。

省博的这一展示资料在历代《琼州府志》的记载中也得到了印证，唐舟、陆普任、石祐和洪溥考中进士的1404年，的确是琼州科举史上登进士科人数最多的一年。他们在1403年的秋闱中也同时中举，这是机缘还是巧合？背后是否有传奇故事？带着这份好奇，笔者联系了他们的宗族裔孙，通过查阅家谱、方志和史料，了解到了有关4位进士的更多故事。

海口市攀丹村历史悠久，由南宋唐氏迁琼始祖唐震与其子唐叔建在1241年创办的攀丹义学堂(即明代的西洲书院)，影响深远。

唐舟、陆普任、石祐和洪溥四人，曾就读于这所声名远扬的学堂。据海南唐氏宗亲会会长唐华清介绍，当时，唐舟系唐震六世孙，父亲唐英为义学堂执掌，不仅亲自授课，还对优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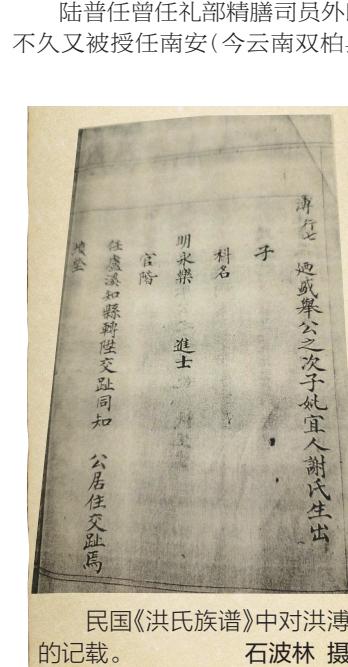
学子关爱有加，传授学业时则是严格要求、耐心教导，他们四人也一心向学，只争朝夕。在这漫长的寒窗苦读时光里，4人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，并结拜为异姓兄弟。他们就是明代琼山人唐舟、陆普任、石祐和澄迈人洪溥。

1403年，这4位学子在广东乡试中一举成名，中举后的他们，又一同赴京参加会试，最终都荣登甲申科的曾棨榜，唐舟、陆普任、洪溥和石祐分别名列三甲第85名、221名、275名和347名。

据已故海南历史文化专家王俞春编著的《海南进士传略》和海南大学教授朱东根的《海南历代进士研究》可知，唐舟曾任新建县(今江西南昌新建区)知县，治理有方，名声逐渐远扬。面对同僚的询问，他以“古人常说新上任的官如处在暗室，轻动必有触损，久坐会自明”作答，展现出理政的智慧。不久，他应求贤诏，升江西金宪，整肃纪度，让郡邑面貌焕然一新。后来，唐舟虽因事降职为衢州判官，又充军到隆庆卫，但他的清廉为官深入人心。仁宗登位后，他奉诏

入朝为监察御史，抗辩内侍陷害黄固等数事，风节尽显。出任浙江巡按期间，政誉颇高，朝野盛赞。

陆普任曾任礼部精膳司员外郎，不久又被授任南安(今云南双柏县)



民国《洪氏族谱》中对洪溥的记载。 石波林 摄

知府。在南安知府任上，他清风两袖，一心为民，深受百姓拥戴。之后，他又担任辰州府(今湖南沅陵)参理总镇，文韬武略，鞠躬尽瘁，誉满辰州。最终，他因过度劳累，于英宗正统二年丁巳(1437年)逝于任上，葬在当地。

洪溥初任湖南湘西泸溪县知县，后转升交趾凉山府同知，与知府易先共同治理当地，使得当地社会风尚得到极大改善。任期届满时，当地军民数千人联名上疏朝廷，请求让他们继续留任。永乐皇帝朱棣允准了这一请求，并晋升他们的官职。后来，蓝山起义领袖黎利起兵造反，局势危急。洪溥与易先坚持组织军民修城练兵，严阵以待，即使面对城中弹尽粮绝的困境，也毫不退缩。最终，城破之时，他们身着朝服，面北而拜，自缢殉国。

石祐考中进士后，上任河南道监察御史。在任期间，他刚正不阿，不畏权贵。他曾奉旨巡按广东，弹劾违法乱纪的都指挥耿全，毫不妥协，以致自己被罢官。即使因弹劾权贵遭受诬陷下狱，他依然不屈不挠，最终得以昭雪。石祐后来改任浙江按察司佥事，他减轻民众负担，深受当地百姓爱戴，被擢升为云南按察司副使。年老归乡后，他捐资兴学，希望以文教振兴乡里，为家乡培养人才。